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历史演进

魏　悦[1]，魏　忠[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 上海金融学院 国际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

摘　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不同，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有其特殊性。近代以来，思想先驱们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都市集中、乡村转移、就地安置和就近进城等思想。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丰富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理论，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8-0048-11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工业化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转移。从产业演进顺序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一般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信息产业，对劳动技能的要求逐渐提高。与此相适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亦从对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在产业结构关系比较平衡的基础上进行，从而实现了城乡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与此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力压迫下为富民强国，采取的是倾斜的结构转换模式，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不能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就业，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集聚。正如张培刚先生所指出的“工业化的成败与否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否妥善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吸纳问题”，[①] 回顾历史

收稿日期：2011-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1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8YD—02)

作者简介：魏　悦(1972—)，女，辽宁沈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
魏　忠(1968—)，男，辽宁沈阳人，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学院讲师，博士。

可以发现自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先驱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丰富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理论,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我国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诸多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改革开放后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偏重于在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模式。这一方面忽视了经典理论模型所依据的假设条件与中国的现实国情之间尚有相当距离,另一方面割裂历史探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会忽视不同历史时期转移思想的传承性和差异性,不利于我们以整体的眼光和系统的观点对转移思想的历史演进做深层次的剖析。本文试图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探寻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和矛盾,以期揭示特殊国情和宏观政策背景下转移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演进规律。具体来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从 19 世纪中叶兴起至今,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萌芽:洋务派的“机器养民论”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晚清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富国强兵必须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资本主义工业。随着机器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推广,传统生产部门出现了大量过剩劳动力。社会各阶层在感叹机器生产高效率的同时,担心它会排挤农民。顽固派更是以“机器夺民生计”为借口,反对机器生产。“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以为人节劳,亦可以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耕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人逸则多欲而易为恶,失衣食亦易为恶”。[②]“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③]洋务派人士立足于发展新式工业,对“机器夺民生计论”进行了理论驳斥,明确提出机器生产虽然会排挤手工劳动,但同时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养民”。

19 世纪 70 年代,王韬率先倡导机器生产“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而其利无穷”,并指出发展机器生产会产生新的生产部门,这样不仅能够将原来节省下来的劳动力转移到新的部门,还可以吸收新的劳动力。“或曰机器是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供以糊口”。[④]王韬已经正确认识到使用机器会对劳动力产生新的需求,但他将这种需求仅局限在与机器直接相关的领域而没有进一步延伸到更广泛的其他产业部门。

继王韬之后,薛福成以成本分析为依据提出机器生产与手工劳动相比,一是效用高,“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二是成本低,用机器则“十

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而“以一人所为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价”。[5]这样，使用机器生产原来本国不能生产的商品，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能扩民生计。“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食其力，……然则商务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国势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民者也”。[6]

陈炽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事实中得出，发展机器生产完全有能力吸纳农业劳动力。他说：“彼国（指西方国家）机器初兴，其手工之人，亦欲竭手足之势与之争利，心尽气绝，无可为生，乃改而入厂工作。……入厂以后，技艺之高者，月得数十元数百元，即至愚极钝者，亦可得七八元或数十数元。向以数十数百作工者，加至数千数万人而未止”，[7]故“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使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8]

由此可见，洋务思想家从王韬、薛福成到陈炽，对机器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得出了机器之采用对“小民之生业，移而已矣，夺则未也”[9]的结论。作为中国独立富强道路的一种探索，洋务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新生产力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机器生产的特点是节约劳动，从短期来看，机器替代手工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种必然现象。技术进步导致传统产业衰落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生产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劳动力的重心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顽固派以“技术进步型失业”为借口反对机器生产，实际是担心遭机器排挤的人们“不辗转于沟壑，必啸聚于山林”，[10]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生产方式，以求得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洋务思想家正视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将发展新式工业与增加就业联系起来，这一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标志着近代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初步形成。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看，洋务派人士以发展机器生产作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手段，举措虽不尽善，认识也略显粗糙，但毕竟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从而反映了他们对于工业化过程中这一最主要问题的敏锐认识与思考，为转移思想的后续发展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深化：民国时期“都市集中”与“乡村转移”的争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从观念和制度上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经过北洋军阀的统治，农村经济日趋衰落，农民离村进城现象“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11]农业过剩人口数量巨大，如

何将其有效转移引起学术界长达30年的讨论。在众多的转移方案中,重工派与重农派的观点为时论所关注。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发展逻辑看,重工派与重农派都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在思想取向和路径上却大相径庭:重工派继承了早期的洋务思想,主张发展城市工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重农派则提倡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一)重工派的"都市集中论"

重工派以袁聘之、吴景超、薛暮桥、戴星如等为代表,强调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在于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吸引农民进城务工。

袁聘之是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挽救农村危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现代工业落后是导致农民失业的根本原因,所以发展城市工业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关键。"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日趋破产,实由于生产率低降,收入减少,农民失业所致。而生产率低降,收入减少,农民失业,又基因于农产品之销路狭滞。农产品销路之所以狭滞,更基因于民族工业之不发达,及原料需要之不能增多。故积极的发展民族工业,增加原料之需要,开辟农产品之销路,吸收农村中之失业人口,实为解救中国农村经济之良药"。[12]

"重工派"的领袖吴景超指出,农民集中于都市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规律,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就在于实行都市工业化。他说:"中国今日人口之大病,病在大多数的人民,皆集中耕种之一业",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提高中国的工业,以及与工业有关的矿业、商业、交通业,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求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集中都市,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可欢迎而不必畏惧的"。[13]

薛暮桥以英国和德国为例论证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现象。中国如果在城市中发展工业,使农业过剩人口转变为产业工人,流民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他说,发达国家"农村人口的减少,主要由于都市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在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非但不会过剩,而且常常感到缺乏"。[14]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样应该"到城市中间去做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店员,苦力等等","目前中国有三个都市的人口在一百万以上,六个都市的人口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人之间,这些新兴都市的繁荣,主要就是农村农民所造成功的"。[15]

戴星如在肯定都市工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载体的同时,论述了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他指出:"工业化之结果,必能容纳大量农村过剩之人口,原来附着于土地,从事耕作之农民,必将纷纷投入工业,成为新兴产业工人";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有利于农业采用机械,从而促进农业的现

代化。[16]

重工派学者大多持类似观点，即“提倡都市工业，……能吸收农业过剩人口，解决社会问题”。[17]以城市工商业为载体，吸引农业人口向都市集中，逐渐实现社会经济转型，这是世界各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道路，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主导思想。重工派的观点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实质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不仅能促进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更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但是相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现实，重工派的理论显然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其所构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在当时只能落空。这是由于受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制约，民族工商业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健康的发展。民国时期“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中国，欲发展工业，开展国民经济，那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干脆地说在没有扫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毒焰以前，民族工业的发展，真难乎其难的”。[18]此外，为摆脱内忧外患，国民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重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相对偏小。国家资本大量投入重工业项目自然无法吸收庞大的农民大军。重工派的理论在近代中国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们试图在发展城市工业的基础上改变传统农业的落后状况并完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设想并没有错。这一思想代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和潮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职业和空间转换，具有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转型的历史进步意义。

（二）重农派的“乡村转移论”

重农派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工业化结合起来，提出了一条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新思路。农村工业化与都市工业化相对应，是指在农村范围内发展各类手工业和建立新式工业。在重农派学者看来，相对于当时中国的需要，最重要的不是农民进城，而是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闲置资源发展农村工业，通过农村工业化消化吸收剩余劳动力。

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主张发展乡村工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他指出：“农村劳力过剩，自然要用到工业上来”，发展乡村工业可以恢复社会购买力，进而刺激工业的兴起，“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19]以此培育工业化的市场基础。

韩稼夫认为农村拥有丰富、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资源，这是乡村工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乡村工业可以使农村经济摆脱对城市经济的依赖。“农村之工业化，就农村经济的立场论之，系为发展农村固有的各种手工业，由工具技术及组织方式的改良，以增加农业经营的收益，……以工业资本移就农村过剩之劳力与低廉之工价与原料，借图生产成本的降低，固不论其为轻小工业抑或大工业也”。[20]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乡村工业与都市工业的关系，为乡村工业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农村工业与新式工业之关系,殊需妥为调整,以期互为利用,并行不悖。一地方农村工业之树立,苟对产品种类与其营业方式有所选择,即不致有与大工厂冲突竞争之机会”。[21]

较早萌发农村工业化思想的郑林庄认为,中国不宜立即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而“应该有个过渡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换言之,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不是吴(景超)先生所主张的如何在农业之外另办都市的工业,而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22]在他看来,都市工业虽然能增加工作岗位,但现代工业重在机械利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农村工业则是在农家或乡村中,由家人或乡民共同参与,而且不需要大量资本,兴办较易,设立较快,“如此,在农村里面有了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失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23]

总的来说,重农派强调农村内部因素的治理,主张将研究重点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转向农村自身非农业化,通过发展乡村工业将城市化重心下移,以减少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降低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压力。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说,农业国工业化包括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部分,单一发展城市工业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工业化的关键是农村工业化。重农派所倡导的“发展乡村工业,就地转移劳动力”的思想是对传统社会分工格局“城市办工业、农村办农业”的一种超越,在劳动力转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当代中国“就近进城”思想的确立也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当然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乡村转移论”面临两难境地,只能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在农业经济破产衰退、农村严重失序的情况下走农村工业化以增加就业的道路,其结局自不待言。为了使农民重新回归土地,国民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在不断失败的结果面前只好对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放任自流。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政局动乱、战争频仍的情况下不可能根本解决日益尖锐的城乡对立关系。这样,历史将这一任务留给了中国共产党。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曲折发展:新中国“就地安置”的战略选择

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可用资本严重不足,资本的市场价格和利率水平较高,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较低。按照市场规律,经济的发展应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面对极端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前苏联“赶超型”战略模式的影响下,力图富强的新中国也试图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直接发展重工业,通过建立重工业体系实现强国富民。由于建国初

期工业化水平较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自身难以获得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于是最大可能地提取农业剩余成为一种体制性选择。除了向农民征收普通税之外，国家还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产品为工业积累资金。为了降低国家控制农产品价格的交易费用，政府对小农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高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如果说价格剪刀差是国家汲取农业剩余的手段，那么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其制度保障。

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期内确实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跃升。但是城市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大大限制了就业容量，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伴随工业化发展而转移出来的进程，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提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采用依靠现代产业部门吸纳农业过剩人口的传统方法太漫长，而任凭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安定也都不利，所以需要另辟蹊径，探索一条费时少、见效快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农村，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26]农业合作化之后，机械化在一些农村初步实施，带来了劳动力的节省，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总体的方向性说明。他说：“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27]“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渐展开，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将日益增多”，[28]所以“乡村中的劳动力是能够在农村中找到出路的”。[29]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与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程度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民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较小，农业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尚在形成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思想的提出契合了当时的国情国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到1958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毛泽东又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通过农村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吸纳剩余劳动力。他说：“中国农村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农业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30]对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毛泽东评价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31]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的思想未能真正贯彻执行，农村工业产值在农村经

济和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微乎其微,没有成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倡导的挖掘农业生产深度、开辟农村生产新领域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由于受到农业发展水平的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未能顺利转移。加之在一定的土地规模和生产技术约束下,“以农养工”的制度安排必然带来农业收益的下降,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收益差距,这必然刺激农村居民涌向城市,从而影响国家赶超战略的实现。为了将农民锁定在土地上,政府推行了严格的户籍政策。1958 年 1 月 9 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模式正式形成。作为就地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显性”制度设计,户籍制度虽然保证了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现,但在城市与农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使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和就业基本停滞,沉重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被隐藏起来。因此,“在这一时期现代结构意义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尚未真正激活”。[30]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新探索:改革开放后“就近进城”的新思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了大规模有序转移的新时期。大量农业人口开始自发地从农村走向城镇、从农业转向工业和第三产业以寻求致富和发展的空间。与改革同行,中共中央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改革之初,由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而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国家对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调整处于初始阶段。党和政府在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同时,仍力图通过农业生产的多样化经营实现农业劳动力在大农业内部的分流与转移。总体来说,这种指导思想符合改革循序渐进的要求,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发挥了铺垫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向城市的流动冲击着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之间严格分离的界限有所松动,存在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社队企业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小城镇进入了调整与大发展时期。1984 年 3 月,中共中央正式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要求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对于乡镇企业在转移农业劳动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31]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东部发

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开始向规模经营发展，通过建立“乡镇工业小区”、“乡镇工业城”、“农民商城”等使农村非农产业向小城镇集聚，开创了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新视角。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张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要都涌进大城市，而应立足于建设新型小城镇，从而为农业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指明了方向。“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32]“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33]1993年10月，江泽民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稳定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搞好小城镇建设”，“使小城镇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34]跨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战略。“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要以现有的县城和少数在建制的中心镇为重点，……引导和鼓励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向小城镇集中，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完善小城镇的功能，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35]

总之，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小城镇成为推进农民流动的新平台，这是将中国国情和西方转移理论相结合的一种新探索，开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具体途径和广阔前景。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向小城镇高速转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在传统体制下被限制的农村工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制度变革成为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主要推动力，这实际上也是对传统体制下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滞后的一种补偿。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农业劳动力从“就地安置”转向“就近进城”将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保证农村和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五、结　语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的转移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推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产物。近代以来，进步思想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深化了人们对社会转型期经济理论的认识。归纳起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城市工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二是优化农村内部生产要素配置，通过农村工业化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三是向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就地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三种思路交替延展，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相契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和发展前景，为当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提供了直接参照。

首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增长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它虽然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结构的根本转变，但“后起”的现

代工业具有资本密集的性质,对农村劳动力没有需求或是弱需求,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一开始便面临城市吸纳的产业障碍。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负效用长期积累就会出现城乡异质的二元经济,消除二元结构的关键在于农业人口城市化。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将贯穿二元经济同质化的整个过程。

其次,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直接走城市化道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只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为避开劳动力一次性转移的"陷阱",在宏观决策上应以就业和均衡增长为目标,按照一定的产业梯度和区位梯度有步骤、有重点地转移。就现实国情而言,应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作为重点,以乡镇企业代替城市现代产业部门、以小城镇代替大中城市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尤其在当前经济过剩成为常态及宏观政策鼓励开拓农村市场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形势下,乡镇企业再次面临发展机遇。因此,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将是明智之举。

再次,为适应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整体需要,应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向。通过构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网络体系组成"形散而实聚"的城市群,有利于增强城市对农村的经济辐射能力,促进农村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这是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的必由之路。

最后,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方向,一是"内向转移",即依靠农业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吸收;二是"外向转移",即依靠工业或第三产业吸收。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区域经济条件差异明显,"双向转移"并举才能开辟广泛持久的就业空间。当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内向转移"为主的初级转移终将让位于以"外向转移"为主的高级转移,但两种不同的转移形式长期并存也是大势所趋。

注释:

①张培刚:《农业与中国的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4 页。

②刘锡鸿:《英轺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9 页。

③王文韶:《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洋务运动》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4 页。

④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 4 卷,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9 页。

⑤⑥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0 页。

⑦⑧⑨陈炽:《陈炽集》,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228、230、245 页。

⑩中国史学会:《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 6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5 页。

⑪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1935 年第 4 卷第 12 号,第 72 页。

⑫袁聘之:《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东方杂志》,1935 年第 32 卷第 16 号,第 23 页。

⑬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45页。
⑭⑮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大众书店1946年版,第108、113页。
⑯戴星如:《战后工业化与农村经济》,《东方杂志》,1944年第41卷第9号,第911页。
⑰⑱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434、439页。
⑲梁漱溟:《往城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乡村建设》,1935年第6期,第78页。
⑳㉑韩稼夫:《中国农村工业问题》,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29、66页。
㉒㉓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独立评论》,1935年第137号,第17—19页。
㉔㉕㉖㉗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2、471、253、254页。
㉘㉙张毅:《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196页。
㉚毛育刚:《中国农业演变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㉛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㉜㉝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13页。
㉞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hought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since Modern China

WEI Yue[1], WEI Zhong[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Shanghai Finance College*,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is an objective economic rul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also has its particularit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forerunners deeply explored the routes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and proposed such ideas as urban concentration, rural transfer, local settlement and moving into nearby cities.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eoretical results from the angl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not only enriches economic theories in transition period,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e for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Key words: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thought of transfer; 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　康　健)